

晚清时期的官修历史

多罗宁

〔摘要〕官修历史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财富，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基础的封建君主制国家里，它被当作特殊的国家制度确定下来。对官修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别关注，产生于晚清时期。一般认为，当时发展到顶峰的史馆修史制度，此后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历史学科。而事实证明，在晚清时期，官方修史仍然起着重要的影响，不过，它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现代性上。

〔关键词〕馆史 朝史 民变史 外国史 边疆问题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7)-02-0001-08

官修历史是中华文明最宝贵的财富，出现于远古时代。随着尊儒术的汉朝的建立，它被作为国家制度确定下来，用以留存国家记录，保障政权的更迭、稳定和有效性。在中国，封建君主制国家之所以能持续存在两千多年，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会参考官修史。所以，官方修史的发展脉络不仅仅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历史问题，还是理解天子的统治事业、决策制定和政治权力运作的关键。对官方修史命运的特别兴趣，产生于晚清时期。当时，帝国统治者在解决清朝所面临的严峻统治危机的问题时，会无比积极地利用官方修史的潜能。史馆修史在这种支持下发展到了顶峰，朝廷史官为18世纪清帝国的繁荣做出的贡献着实不小。^①而之后爆发的危机，为此画上了句点，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新阶段。一般认为，中国正是以此为分水岭，开始积聚力量，加快传统社会生活、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官方修史再无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历史学科。然而，事实是帝国并未做好彻底变革的准备。

众所周知，清朝一向自诩正统，以文明价值和中国现行基本制度的传承者自居。对受到清朝严格教育的精英们而言，这是不容侵犯的准则。所以，在被迫处理危机、反抗西方列强侵略时，帝国政府把维持稳定和确保帝国继续统治数世纪当作了主要任务。19世纪，著名学术精英代表们开始研究和宣传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公羊学派的思想。^②与儒家思想有关联的是19世纪格

〔收稿日期〕2017-02-12

〔作者简介〕多罗宁（Б. Г. Доронин, 1928-），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oriord1@hotmail.com

① Доронин Б. Г.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Китая XVII - XVIII вв.".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02 г. 白寿彝主编，向燕南、张越、罗炳良著：《中国史学史》第5卷《明清时期（1840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谢保成编：《中国史学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73-1373页；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 龚自珍对这一概念有深入研究。

③ 李荣胜：《国学是什么》，华夏出版社，2000年。书中还提出一点，即晚清政府在自己的政策中坚持以文明价值为先的原则——“鉴古斥邪的稽古右文”。

外流行的“中体”。将这一概念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使之适应于当时现有条件的，是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张之洞（1837—1909）。而内涵直指向文明价值的是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的“国学”，它被阐释为儒家和历史赖以构成的所有古典人文知识的反映。^③“国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国粹”教育。中国社会和社会各阶层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这种真实态度，被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视为文化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形势下，帝国政府对官修历史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者的受需要程度和活跃度并不低于18世纪。但不同以往的是，晚清时期的官方修史不得不适应新的条件，从而形成了从前没有的特点。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官修历史的根基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一）清朝史

19世纪清朝经历的残酷考验并未对历史文献整编工作造成什么影响，它们一直持续到朝代灭亡。在当时，史官在朝廷最严苛的监督之下按照特定规则编写的重要著作的大量存在，为帝国主要历史著作的编写者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它们均为多册手稿，作为特别重要的文献资料保存在帝国的档案馆，如实录、起居注、国史等种类。^①

对王朝的形象和解决所面临问题具有根本意义的，是《钦定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的编写。第一部会典属于历史著作中的政书一类，包含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关分支既定运作规则的详尽描述。有五朝会典，光绪朝会典及图、事例，规模超过1500卷。标题中的“钦定”字样表明了这部著作的特殊地位，只有少数最重要的史官作品才能得此称号。^②

《大清一统志》属于方志类，这一类作品在官修史书中数量巨大，含有关于作品所记述地区的包罗万象的信息。根据规定来看，《一统志》是各地区方志的总汇集，但实际上，史官面临的任务是要将帝国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描写，精准确定各地区的边界和位置。元朝史学家的这类著作就是如此做的。清政府首次产生对这类著作的需要是在18世纪完全确立对中国的统治时刻。之后，该书被多次修订、增补，19世纪末终成典范之作（530卷）。在该书中，帝国的疆域是按照19世纪初的情况来描述的，因为在那个时刻，清朝皇帝在18世纪所致力“疆域拓张”已经完成。^③

危机期间，还出现了一种极受需要的历史著作类型——《经世文编》。这种陈列统治者丰功伟业和解决重大问题经验的官方资料的汇编从19世纪开始出现，那时王朝开始失去权力，迫切需要保持和稳固自身地位。1826年，鸦片战争前不久，出现了这样一本著作，名为《皇朝经世文编》（120卷），组织编写此书的是19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魏源（1794—1857）。在19世纪末，这类历史著作是最为需要的史书类别之一。历史学家们在数年间创作出了一系列的类似著作，构成其基础的，是一些在内容上可以相互补充的官方著作。^④

中国官修史书中，王先谦（1842—1917）所著的《东华录》可谓发其新声。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合集作品（624卷），按时间顺序描述了10个清朝皇帝的统治事迹。王先谦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宣布，将致力于续写蒋良骥（1722—1789）在18世纪中叶完成的、简要记录早期清朝皇帝功业的官方编年史。不过实际上，王先谦只保留了这部作品的名称和编年体形式，他如实详尽地描述了清朝全部统治者的业绩，包括蒋良骥写过的那些。王先谦涉及的问题是要通过政府的核

① Доронин Б. Г.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Китая X VII - X VIII вв.".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02 г., стр. 46 - 82. 冯尔康：《清史史科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第33—42页。

② 冯尔康：《清史史科学》，第63—70页；谢保成编：《中国史学史》第3卷，第1219—1221页。

③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367—380页；冯尔康：《清史史科学》，第161—185页；谢保成编：《中国史学史》第3卷，第1225—1236页。

④ 《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三编》《皇朝经世文四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参见冯尔康：《清史史科学》，第219—223页。

准，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使用“实录”的许可——王先谦其实是在摘写“实录”的内容。

《东华录》的编写持续了很多年，到1915年才完成。这是清朝的第一本编年史，在此之前史官们从未创造过这样的著作。尽管当时清朝已不复存在，但《东华录》并未失去它的价值，它还是长久地成为了有关中国历史上这三百年状况的主要史料。^①

（二）晚清史

到19世纪，史学家们无法再局限于编写皇朝历史的概括性著作。18世纪末起在帝国的广袤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事件，不仅破坏了国家的主权，也威胁到了它在远东地区的强国地位，而国家的统治者又自比为古代圣明贤君。为了维护王朝形象、统一政权、寻找解除危机之法，官方对正在发生之事的阐释便十分有必要，官方将从儒家立场出发去理解各事件，并使之符合所奉行的统治原则。而能解决这一任务的，只有官修历史。晚清历史学家均将注意力聚焦于现代性问题，这种将官修历史中的问题现实化的现象乃首次出现，其中有以下几个对政权而言最重要的主题：

1. 民变史

内政形势变得无比严峻，是清朝的一大威胁。18世纪末起，规模空前的民变威胁着王朝的统治，不仅中央地区如此，各地方也是。19世纪中叶，清朝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之下几乎失去江山。日渐式微的王朝同自己的子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这不仅让王朝元气大伤，帝国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诉诸武力的行为还彻底违背了儒家的信条，因为合法的统治者是不能如此做的。儒家学说把民变浪潮的高涨解释为上天对朝代注定很快灭亡的征兆。所以，民变成为晚清历史学家在自己著作中常常涉及的基本议题之一。

清帝国自17世纪起的政府军事行动被历史学家们记录在了方略类的官史著作中。一般而言，它们是在所记载行动一经结束后便立刻由政府严密监督完成。18世纪时，监督工作由军机处负责。这类著作的名称中常有“平定”字样，此术语源自传统政治文化，意指天子之举的特殊性。进行“平定”一般是在所有其他措施毫无成效时才会采用。清朝历史学家在20年内创作出了将近70本方略，其中19世纪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②多是镇压民变，最为重大者是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撰成后被称为《钦定剿平粤匪方略》。

该书的编写由皇子奕訢（1833—1898）负责组织，最终内容由皇帝本人亲阅后确定。和所有其他类似著作不一样的是，它的名称中没有惯常的“平定”，而是用了“剿平”一词，这说明了政府同主要敌人进行斗争的特殊性和严峻性。奕訢负责编纂的还有三部关于镇压19世纪最大民变的书：《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和《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序乃皇帝本人所作）。^③

对其他的民变活动，朝廷史官们也不会忽略。因此到19世纪末，清朝出现了很多部记录政府镇压民变的官史，政府在其中一般扮演着统一的角色，即有足够的力量一统天下。此前，中国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著作。

2. 外国史

民变并未被帝国政府视为主要的威胁。19世纪，帝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国外。在中国，长久以来广为坚持的闭关锁国观念被打破，对外界毫无兴趣、缺少积极交流的状态无法再继续。在中国自古形成的世界格局观念中，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则都是蛮夷居住的外邦。同蛮夷之地

①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6—292页。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42—45页。

② Доронин Б. Г.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Китая X VII – X VIII вв.》.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02 г., стр. 102—105.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339—347页。

③ 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第36页。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9): in 2 vols., ed by H. W. Hummel, Washington, 1943—1944, vol 1, p. 383.

的交往以儒家道德为基础，而这需要以掌握帝国外交范围内的国家、民族的相关信息为前提。收集并思考这类信息，积累相互交往的经验，成了朝廷史官们的任务。他们虽没有专门编纂外国史著作，但在许多官方著作中，都包含了各类对政府而言必需的相邻地区的信息。对距离远的国家，清政府实际上并不感兴趣。如欧洲人16世纪初就出现在了中国的沿海地区，虽然清帝国不得不常常与之来往，但却没有深入接触这些过客的打算。19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出于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此前素不相识的世界建立相互关系的需要，政府被迫求助于官方修史，没有它，这些难题在中国就无法解决。而首当其冲的，是了解沿海国家及其特点。朝廷的史官们无法高效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由其中已经和外国人打交道多年的人来做。由于书官外国史的作者只能通过国外史料获取必要信息，所以掌握一门语言并不够，另外还需要判定这些史料是否存在问题，所以没有帮手，中国的学术精英做不到这些。通常，予以帮助的是代表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在编纂这类著作的过程中，他们的作用非常大。

19世纪，在最早记录外国的人中，有当时的高官——林则徐（1785—1850）。他专门受命治理广东的鸦片走私贸易问题。他将当时在帝国已经司空见惯的外国人视为蛮夷，并在自己的一篇呈文中提醒皇帝，定期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其优劣的必要性。林则徐认为，不如此就无法成功与他们对抗。到达广州后，他便委托自己的属下做这项工作。他也求助于外国人，让后者提供必要的文献，因为当时，他们的主要史料只有已在英国出版的《地理百科全书》（*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Murray H., London, 1834）。

鸦片战争刚刚爆发时，林则徐便决定以所获资料为基础，编纂一部关于外国的专门著作，取名为《四洲志》。这是一部简明的工具类书籍，包括四大洲（这是佛家传统的分法）30个国家的信息。该书于1851年出版，但很明显，当时知名度并不高。^①不过，该书启发了与林则徐早有合作的著名学者魏源去创作同样题材的详实作品。鸦片战争时期，魏源便已开始着手进行此事。几年后，他的作品问世，内含外国的各种丰富信息，名为《海国图志》。此书主要由（通过助手）取自国外史料的信息编成。魏源也使用了林则徐的作品，以及一些朝廷史官著作中出现的材料。《海国图志》内容的最终敲定不是一蹴而就，起先作者坚持不懈地编写，在作者去世后，该书又得到不断的扩充和编辑，直至19世纪，最终版的内容几乎扩充了两倍。^②和林则徐一样，魏源把西方列强的侵略视为蛮夷入侵。他所收集的沿海国家的信息，对政府的外交实践应当有所助益。“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③这些都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根据这些准则，必须做到“变夷”，以便成功与蛮夷对抗。魏源作品的基本内容，就从详细描写“变夷”的必要做法以及源自传统政治文化的方法等综合入手。魏源称之为“筹办”。而且，在做完书的“理论”部分后，魏源还描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帝国对外关系编年史编撰的常例。在冗长的结论中，作者再次提出了蛮夷的问题，和序中已谈过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进行呼应。魏源在这里集中写了“师夷”，赋予了这个传统政治文化理论一个非常现代的称谓。他强调，应向蛮夷学习使之变强的地方，即科学和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这位著名的学者精英代表得出此论断并非偶然，它表现出对于能给帝国带来如此沉痛打击、并要求得到特别待遇的蛮夷的日益成熟的理解。^④

林则徐和魏源关注的主题在19世纪一直得以延续，并由此诞生出一系列描写外国的作品，

① Врядий С. Ю. Линь Цзэсюй. Патриот, мыслител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деятель ц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3г., стр. 90—94.

②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3卷，第161—179页。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6卷《近代时期（1840—1919年）》，第70—84页。

③ 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④ 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143—148页。

其中一些至今都没有失去价值。在国家刚遭遇侵略危机的同时，帝国的文士精英们便开始着手记录发生在国家东南方的重大事件。到 19 世纪末，加入这一行动的还有朝廷的史官们，对刚展开发生的侵略进行思考和阐释正在成为一项国家级的事业。

而对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具有根本意义的，是魏源的又一部作品——《圣武记》的出现。该书在鸦片战争刚刚爆发后完成。从形式上看，这部作品和列强侵略没有关系，而是关于清朝早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朝地位、统一政权而在战场上建立的功业。但是，作者感兴趣的却并不是将其写成一部军事史。在帝国面临灭顶之灾时，魏源不仅为帝国的建立者歌功颂德，还表示他们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是因为遵循了源自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武功”原则，这一原则为面对包括和蛮夷斗争在内的问题的统治者指出了一条灵活的、非武力为主的解决之道。魏源强调，正是这一点，令清朝的建立者创造了鼎盛的王朝。在清修史书中，首次将“武功”作为天子必备品质的是 18 世纪末的著名学者赵翼（1727—1814），他有一部相关的作品——《皇朝武功纪盛》。有关这一理论的首创者和推广者，从清修史书来看，是魏源。在《圣武记》中，魏源把它表示为“圣武功”。朝廷史官们在记述反侵略斗争时，还把“圣武功”当作帝国时任统治者对这一概念的实现。^① 轰隆的炮声刚一结束，他们就遵照圣旨在 1856 年写成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是官方对道光年间（1820—1850）帝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解释。该书从 1836 年开始讲起，当时鸦片走私问题已经相当尖锐，战争呈一触即发之势。1867 年，一部分分析咸丰帝统治时期（1851—1861）事件的著作诞生，而那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一系列作品以 1888 年同治年间（1861—1875）的事件记录而告结束。^②

除了遥远的沿海国家，晚清史书还提到了两个邻近国家——俄罗斯和日本。清朝政府对这两个国家知之甚详。显然，对关于它们的历史著作的需要并非偶然发生，这也是被 19 世纪清朝的形势所激发的。

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是中国的旧邻，17 世纪就有联系，虽然方式各异，但从未间断。对俄关系始终在帝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19 世纪变得尤为紧要。所以，顺理成章出现了第一部专门介绍欧洲国家的著作——《俄罗斯国纪要》。这是林则徐在编纂《四洲图志》的过程中完成的。虽然政府握有重要信息，但林则徐还是认为，有必要对这些信息进行重新思考和判断。这本小书按地区对俄罗斯做了简要介绍，指出了地区中心、各省边境常驻军队数量、地区居民的宗教信仰及其他信息。不过，林则徐的动机并非是为同胞们介绍邻国，而是介绍帝国的北部边疆有什么强国。林则徐强调，这样的俄罗斯，是由其著名的统治者——国君瓦西里三世、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缔造的。彼得一世更是为俄罗斯的繁盛做出了特殊贡献，在书中与彼得一世相提并论的是与其同时代的人、清帝国的奠基者——康熙帝。史书编修时将天子和国外统治者进行类比，此举在政府努力解决危机的大背景下首次具有了原则性意义：自此，在清朝历史著作中，将两位君主做类比成为了一种范式。^③

林则徐的这部作品并不为同时代人所熟知，它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才以《俄罗斯国纪要》文集的形式问世出版。文集还包括另外两部描写俄罗斯的作品，由吴大澂编辑并题序。此人当时正奉皇帝之命研究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疆界问题，他在书中表达了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④ 几乎就在同时，年轻学者何秋涛开始和林则徐一起编写《朔方备乘》。虽然从名字上可以看出，这部作

①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 3 卷，第 146—160 页。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 6 卷《近代时期（1840—1919 年）》，第 58—69 页。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 342—350 页。

②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 344—345 页。

③ Линь Цзэюй. Основные сведения о росси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Факсимиле ксилографа. Издание текста, перевода, комментариев, приложение С. Ю. Вряди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6г.

④ 对俄罗斯持负面态度的欧洲传教士作品的译本，19 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出现。

品是研究帝国北部边疆问题的，但是，作者的主要注意力实则集中于清朝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史，他把中俄关系史置于中国北部边疆在对俄关系的不同阶段所处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这片非汉人聚居的土地永远都是天子的心头大患。

何秋涛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取自前辈史学家的官修史著作中所列的各种资料的汇编，他在要人庇护之下编写了这部以解决国家问题为目的的作品，并认为此书的使命在于“备用”。《朔方备乘》完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并被立刻上呈给皇帝。在帝国的危难时刻，皇帝得阅此书，并为之赐名（何秋涛本人取的是另一个名字），收入皇家藏书中。然而，这部书接下来的命运却令人扼腕，它很快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作者的复印本也随之被毁。很多年后，1881年，它才在当时最显赫的官员之一——李鸿章（1823—1901）的命令下得以修复和出版。李鸿章一直负责监督帝国的外交政策和与俄罗斯的交往，他为《朔方备乘》撰写了序。对中国社会而言，这部作品多年来一直都是有关中国与北疆邻国关系的基本史料之一。^①

清帝国的另一个邻邦——日本，在帝国历史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两国自古就有往来，中国更是日本多年致力追赶的榜样，但是，两国之间的交往却并不紧密，清帝国对这位沿海邻居的兴趣也不大。19世纪中叶展开的持续数十年的彻底革新令日本摇身一变为强国，它开始觊觎帝国的领土，试图占领中国在远东地区一直把持的地方。清政府无法再对这个国家视而不见，它在清朝的对外政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了研究邻邦，必须明确使日本变强的原因所在。这个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国家的经验，可以被借用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这比清政府“师夷”所指的借用欧洲列强经验要简单得多。这促使当时的大政治家黄遵宪（1848—1905）开始创作《日本国志》。《日本国志》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日本的著作，主题是维新，该书1887年出版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此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前。黄遵宪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决之道，但并没有破坏当时官修历史的基本原则。《日本国志》至今为止仍被认为是晚清史学家编纂的最成功的外国史书之一。^②

（三）辛亥革命之后的官修历史

清朝的危机到底没能解决。1912年，隆裕太后替年幼的清帝签下了退位诏书，中国从此成为共和国。官修历史——帝国最重要的制度，似乎也该随着封建帝国就此一同消亡。但是，结果却非如此。

1912年，民国建立仅3个月，总统孙中山（1866—1925）就下令修史，并为此成立了类似于封建时代最重要的官方修史部门之一——国史馆的专门机构。此命令确定了该机构的结构和人员，它主要负责收集中华民国建立的相关史料。1914年，曾经最显赫的清朝政治家之一——袁世凯（1859—1916）取代孙中山，就任民国总统后，该机构才开始运行。

与此同时，1912年6月，统帅部位于汉口的黎元洪发布命令，成立机构以编纂实录，但当时，这种编年史的内容不应再是记录已故皇帝们的统治，而应是民国的建立。所有这一切说明，传统的官修历史对于辛亥革命后千差万别的政权势力而言都是必需的。这很容易理解：中华民国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实际上都是清朝的臣民，他们从幼年起就接受尊重文明价值的教育，在解决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新问题时，他们努力植根于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们而言，官修历史是不可或缺的。官方修史在中华民国保持着长久稳定的地位，并在民国政府的庇护之下得以顺利进行，其撰

①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3卷，第218—230页。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6卷《近代时期（1840—1919年）》，第137—151页。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167—170页。何秋涛的作品一般被认为是谈论疆界问题——这也是大量晚清史学家作品的研究主题之一。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何秋涛的作品和传统对边疆问题的阐释是格格不入的，边疆问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主题，需要专门研究，何秋涛在此文中并没有论及。

②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3卷，第303—321页；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6卷《近代时期（1840—1919年）》，第178—193页。

修内容主要集中于覆灭不久的清代历史，并对晚清部分进行续修、增补。

光绪朝（1875—1908）实录的编撰一直持续到1921年。这部编年史共计597卷，是该体例中规模最大的作品之一。编写这部统治事迹实录的，是年幼的继承人溥仪——中国最后一任皇帝，他在位三年间，组织编撰了整整70卷编年史。^①清朝灭亡后，其中一部分于19世纪已经开始编写的重要清代史著作依然完成并出版。1915年，王先谦所著《东华录》完成并出版。1921年，刘锦藻（1862—1934）完成了从13世纪起开始编纂的三大经典百科全书——“三通”之一的百科全书《文献通考》清代部分的续编。^②这些年间，黄鸿寿也结束了多年的《清史纪事本末》编写工作，这部史书有一半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小事件。而民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史学界最重大的现象是两部断代史——《新元史》和《清史稿》的出现。

以上这些作品都属于正史。正史自公元前上古世纪出现后就一直是帝国官方修史的重要环节，是国家最重要的史料。朝代史不仅是朝代统治时期相关信息的基本来源，还具备一个重要的功能，即保证中国王朝政权交替的合法性。

《新元史》的编者柯劭忞（1850—1933）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从19世纪开始着手编写这部史书。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表面原因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官修元史还不完善，这一点人尽皆知，但实际上却另有原因。柯劭忞认为，元朝统治时期达到了“华夷大同”，而在清朝处于危机之时，元朝统治者的这一经验便具有了现实性。晚清时期，元史一度盛行，当时的历史学家写了若干相关著作，其中声名最高的就是柯劭忞的著作。1921年，柯劭忞完成《新元史》这部鸿篇巨制（共257卷），立刻受到政府重视，政府首脑亲自为之题序（在封建中国，这有时是皇帝做的），并马上资助出版发行。^③

对中华民国政府而言，《清史稿》的编撰也具有特殊意义。这是新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政府为之成立了由300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任命赵尔巽（1844—1927）为总裁。委员会决定，以中国被认为最优秀的断代史作品——《明史》为例进行编修。对他们来说，史料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清朝统治三百年间，政府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编修本朝历史。不过，想要创造出一部民国时期的货真价实的、符合全部要求的朝代史，似乎也不太可能：这些史书讲述了皇权依照天意在王朝之间的交替，却没有预见到君主制将会被共和制取代。自委员会着手编撰以来，直到1920年，清代史的预备方案才出炉，1927年最终方案确定，总计529卷，这是中国编修的规模最大的朝代史书。

书名中的“稿”字，很明显意味着这部作品是未完成的，具有预备性。许多对同类史书而言的经典问题在《清史稿》中都有了新的、特别的叫法。书中提到，20世纪初中国的政权更替不是依照天意，而是基于尊重民意、为国家探索革新之路的旧朝的意愿（封建时期，朝代的更迭以简化传统的基本国家制度为前提）实现的。一般来说，新朝的代表者在朝代史中会被塑造成正面形象，但《清史稿》的编者却拒绝了这一原则，他们对辛亥革命中的一些事件给出了负面评价，而对许多积极参与革命的人的活动不予置评。

《清史稿》正好出现在国家面临政治危机的关头，但它不仅没有被人忽略，反而还引起了中国社会最广大阶层代表的激烈反响（一般是负面的）。人们强烈呼吁停止已经刊行的书本在市面上流通，并禁止以后再版它。然而，1935年，根据政府首脑的决议，《清史稿》获得了正史的地位，和《新元史》一起被列入18世纪末由乾隆皇帝确立的官修朝代史体系中（当时由二十四史

① 谢贵安：《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130页。

②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3卷，第399—406页。

③ 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103—105页。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3卷，第438—456页。

构成)。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官方修史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它从未如此被权力需要。对中国在历史转折期的这些历程，官修历史起着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它是儒家君主制中最稳定的制度，顺利度过了君主制的崩溃期，继续为民国政府服务。中国在此基础上，逐渐积聚力量，新的现代史学由此展开。当时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梁启超（1873—1929）认为，为此需要“增其新而不使其旧”。

References

Bai Shouyi ed. *Zhongguo shixue shi*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Vol. 5 and Vol. 6.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6.

Cang Xiuliang ed. *Zhongguo shixue mingzhu pingji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 Historical Literature), Vol. 3.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2006.

Cang Xiuliang. *Fangzhixue tonglun*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Gazetteer Studies). Jinan: Qilu shushe, 1990.

Feng Erkang. *Qingshi shiliao xue* (Studies of the Qing Dynasty's Historical Sources). Shenyang: Shenyang chubanshe, 2004.

Li Rongsheng. *Guoxue shi shenme* (What is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2000.

Qu Lindong. *Shixue yu shixue pinglu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Review).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she, 1998.

VradiyS. Y. *Lin Zexu: A Patriot, Thinker and Statesman of the Qing Dynasty*. Far Eastern Ferderal University Press, 1993.

Wang Jilu. *Qingdai shiguan yu qingdai zhengzhi* (The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and the Qing's Politics).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2009.

Xie Baocheng ed. *Zhongguo shixue shi*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06.

Xie Guian. *Zhongguo shilu ti shixue yanjiu* (A Study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Veritable Records). Wuhan: Wuhan daxue chubanshe, 2007.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Late Qing

B. G. Doronin (Orient Faculty, Saint Petersburg University; oriord1@hotmail.com)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was an most important asse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hile there was a monarchy which wa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separate state institution. That is why its fate was not only a historical issue, but it was also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Chinese ruler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late Qing.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by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had achieved its pinnacle in the Qing and afterwards a new doctrine of history appeared to replace it. Nevertheless, reality proves that even during that most complicated period it functioned even more effectively than it had ever before. But the character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more attention was focused on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ity.

① 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 108—111 页；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 3 卷，第 421、437 页；冯尔康：《清史史科学》，第 45—57 页。